

主编◎杨兴锋 李根基

世紀廣東學人

送予



南方日報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中國·廣州

世紀廣東學人

主編◎楊興鋒 李根基

第一輯

選書



南方日報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广东学人 / 杨兴锋, 李根基主编. —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491-0236-5

I. ①世… II. ①杨… ②李… III. ①知识分子—生平事迹—广东省—近代 IV. ①K820.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1944 号

世纪广东学人

杨兴锋 李根基 主编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话: (020) 87373998-8502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2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3000503 读者热线: (020) 83000502

网址: <http://nf.nfdaily.cn/press/>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世纪广东学人》编委会

封面题字：饶宗颐

主 任：杨兴锋 李根基 王春芙 张东明

副主任：丘克军 区广安 王培楠 江艺平

编 委：陈广腾 苏章耀 陈 志 周洪威

郎国华 戴学东 梅志清 孙茂勇

李 贺 蒲荔子 金 强

序

◎ 林雄

广东是中国的第一经济大省，但广东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如何，却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广东是“文化沙漠”。持这种论调，或者是对广东文化不了解，或者是我们挖掘、宣传不够。其实，广东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广东的近现代，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吸纳了世界先进文化的养分，引领时代之潮流。近代广东人才辈出，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令我们无比自豪的，是这种人才的涌现呈全方位的态势。以学术领域而言，中国最早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是从这里起步的，近代医学教育是在这里开始的，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都是在这里较早发展起来的，包括地质学、植物学、无线电子学、激光光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等。完全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是广东学术的伟大时期！与之相伴生的，就是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卓然屹立于学林的大家。《世纪广东学人》对这些学术大家的遴选遵从了两个标准：首先，他必须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里有创造性贡献；其次，他在中国学科的发展里有创造性和奠基性的作用。这两个标准，足以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前辈学人在任何时候都堪称广东的文化脊梁，在今天，无疑更是我们建设文化强省的底气所在。

《世纪广东学人》中的学人们，或在广东诞生成长，积聚能量，如梁启超、岑仲勉、邹鲁、陈序经、陈垣、罗香林、张荫麟、梁方仲、张竞生、容庚、杨成志、丁颖、陈国达、陈耀真诸先生；或在广东传道授业，传播智慧，写就了自己生命中最为传奇的一页，如陈寅恪、姜立夫、朱谦之、陈心陶、王力、冯秉铨、毛文书诸先生。无论是“走出去”的，还是“走进来”的，“广东”二字，都是学人们身上的一个鲜明印记，提及他们，能够自然而然地与广东产生联想。这部《世纪广东学人》所遴选的，还仅仅是他

们中的一些，今后还将有姊妹篇，对“世纪广东学人”来一个“集大成”。然而，仅仅从这一些中，已足以让后辈窥见了广东学术文化曾经达到的水平和高度。我们看到，广东的文化影响决不逊于他人，只是之前还做得不够系统，没有形成规模，没有造成声势。现在，《世纪广东学人》弥补了这一缺憾，曾经群星璀璨的广东学人，借助这一平台得以集中地、系统地、生动地浮现于大众视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普及。

我们缅怀20世纪的广东学人，在充分发掘广东优秀文化资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接续绵绵不绝的广东学脉，为今天的广东树立学术标杆。具体而言，追忆那些独步学坛的旷世学人，就是要大力彰显他们严谨务实的治学为文之道，让他们“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学术精神，能够穿越时光，为日益喧嚣的当下社会注入一丝清风；就是要大力弘扬他们爱国为民、兼济天下的救世风骨；就是要大力学习他们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道德风范。广东文化强省战略明确提出，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力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和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示范区，形成具有中国气派、岭南风格、广东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为此，我们需要借助前人留下的一切文化遗产，来提振建设文化强省的信心和勇气！

继《广东历史文化行》、《岭南记忆——走进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南方日报和南方日报出版社又以《世纪广东学人》向大家奉献了一道历史文化大餐，这道大餐营养同样丰富，值得我们永远地咀嚼、回味。

是为序。

（本文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录

前言 志于道 6

陈寅恪···剩有文章供笑骂 8

梁启超···从桃花源人到世界公民 28

岑仲勉···于无声处听惊雷 56

姜立夫···一介夫子立数学 岭表津门延泽长 62

邹 鲁···树木树人兼树谷 规模远托百年心 80

陈序经···全盘西化先锋 岭南第一校长 寂寞文化学人 94

陈 垣···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110

陈心陶···席地破屋鼠为伴 呕心沥血驱『瘟神』 128

朱谦之···为中大人文精神奠基 144





黄 节… 湮没的岭南诗宗 160



罗香林… 客家君子赤子心 176



张荫麟… 自古才为累 天怪狷与狂 192



梁方仲… 天留迂腐遗方大 路失因循复倘艰 210



张竞生… 五四新文化另类宗师 226



容 庚… 宁去跳珠江 也不批孔子 242



丁 颖… 『以蚂蚁爬行的精神苦干到150岁』 260



杨成志… 坚忍不拔之宏志 可步张骞通西域 276



冯秉铨… 愿得英才三千数 春蚕丝尽方长眠 294



陈国达… 大地之子 304



王 力… 百年来最卓越的语言学家 314



陈耀真… 毛文书… 中国眼科界的『居里夫妇』 332

在20世纪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交融、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广东得风气之先,无论是文史社科,还是自然科学,都涌现出一批学术大家,通古今之变,汇中西之学,为广东学术赢得了不少“第一”,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气象:中国最早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从这里开始;近代的医学教育在这里起步;许多自然科学学科都在这里较早发展起来……

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曾有一个久久不解的疑问: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这个疑问似乎正因1890年前后的中国而问。清季民初,风云激荡、世局巨变的中国,学术大师成群而来。

大师之中,有一群人绕不开广东这片土地。他们或在此诞生成长,积聚能量;或在此传道授业,散播智慧。他们“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们的文字用永不褪色的黑夜写成,光芒使人类的白天更亮。但他们是谁?

这许多本该辉煌的名字,今天仍是很多人认知的盲区。我们知道粮食,但不知道现代水稻之父丁颖;我们知道梁启超,但不知道梁启超为什么说“知我罪我,任天下后世评说”;我们知道张竞生“色情博士”、“一代文妖”的离奇称号,但不知道他的美学主张与逻辑学思想;我们知道陈寅恪先后留洋16载,通晓20余种文字,但不知道他目瞑足踟后心里涌动着什么,使他写下诗句“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

学人们探求学问的神奇,很多时候,只留下了传奇的痕迹。所谓传奇,就是传得多了,以讹传讹,格义附会,便为人所称奇。“侧帽风流独孤郎”,美男子独孤信帽子被风吹歪,却被满街慕信而仿;加诸学者们身上的光环,同样不可捉摸。

因此, 我们想回到现场, 在纸上和他们一起谈笑风生, 笑看风云。回到陈寅恪的少年, 看他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 放下蚊帐偷读古书, 通宵达旦。回到梁启超的青年。回到岑仲勉的中年, 看没有家学渊源, 没有进过名校, 没有留过洋, 没有名师指点, 甚至不是科班出身的他, 如何自学到40多岁终在史学界崭露头角。回到所有人的老年, 黄卷青灯, 看看他们在懊悔什么, 欣喜什么, 坚持什么。

现场有时也并不可靠。可能我们会因此看到真实影像, 也可能会再次被混乱之光刺晃眼睛。孤独的思考者绝意浮名, 不干寸禄, 一辈子在冷板凳上精研学术, 最后只在历史角落里静坐。而有人才疏学浅却长袖善舞, 阉然媚世却自鸣得意, 在舞台中央挥霍声名。我们只能等待, 等待时间将所有该带走的带走, 该留下的留下。

时间有时也并不公平。天才如张荫麟者去得太早, 要用“蚂蚁爬行的方式, 苦干到150岁”的丁颖活得不够长, 而有的人却能凭长寿而荣。我们只能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会邀请静坐者发声, 叫聒噪者一边呆着。当大学变成江湖, 当江湖上流传教授论文抄袭, 学者们忙着用良知购买钱币, 导师爱女生超过爱自由, 我们固执地相信, 相信未来时间会带走这一切不光彩的现场。那些混乱浅薄的发言, 阉割过的文字, 还有人们被刻意培养的奴性, 也会带走。

是过去让我们相信未来。当看到孔子说“士志于道”, 看到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 以救世也”, 看到陈寅恪说“惟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 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你应该明白他们并不寂寞, 他们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追忆过去, 并不是为了给未来制造更多传奇, 而是为了给今天描画理想。为了提醒人们智慧是什么色彩, 不带功利之心的为学之道本应如此。提醒人们, 这片土地上曾有成群天才, 他们都有一颗不肯媚俗的心。他们的生活细节还活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但还是太少; 他们的赤子之心躺在图书馆里, 但应该穿透人心;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和灵魂, 无论阴暗光明, 本应像朋友一样与我们相伴, 像老师一样带我们探索, 而不是像现在, 遥遥相望, 若有若无。

不要以为这和你没有关系。即使你每天躬耕劳作, 或是玩世不恭, 你也依然有享有理想的权利; 即使你不爱他们的智慧, 你也会爱他们的有趣; 即使你从不看书写字, 你也难以否认, 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 形成了你生活中美好的部分。

也许你还是怀疑, 有没有必要用这么多版面, 挖掘一群逝者的生活和念头; 主宰我们生活的不是历史的坟墓, 而是现实的迷宫, 是飞一般的房价, 摧枯拉朽的拆迁, 蝇营狗苟的生活。其实我们也这样怀疑。纵然他们的思想和学问曾让这个国家前进, 给这片土地荣耀, 但这个时代, 温和的声音已不可能惊雷破柱, 理性的思考已无法怒涛惊海。但还是请你接受这微小的力量, 就当是做了一个有关理想的梦。梦醒后, 我们依然投身于火热的生活。

学人小传

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出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他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中国一代学者的人格理想。

他并非广东人，但1949年定居岭南后，在广东写就了自己最为传奇的一页。其晚年穷十年之功完成的皇皇巨著《柳如是别传》，被视为其一生学术范式的总结。



陈寅恪：

剩有文章供笑骂

2009年11月12日，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日。当天上午，中山大学的学术精神圣地——陈寅恪故居修缮后开放。一楼大厅入门正对处，陈寅恪先生手拄拐杖的半身塑像，“打量”着这座小红楼的参观者。这天也是广州亚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日子，新闻中写道：当晚盛大的庆典仪式上，365个儿童手持“星星”，木棉红花绸带凌空而降，木棉花瓣漫天飘舞。

即使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教授中的教授”、“活字典、活辞书”，陈寅恪在世时也几乎没有俗世的名声。因为他从来不写通论性的文章（《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不能算正式论文）。比起梁启超、胡适、鲁迅这些家喻户晓的名字，他只是地道的学院式人物。

陈寅恪大概想不到，他身后会因为1995年那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焦点人物；那些掌故轶闻、啼血经历，成为人们附庸风雅的谈资，似乎谁不说陈寅恪，谁就是浅薄无知。

15年过去，这股“陈寅恪热”似乎降到了常温。学术界对陈寅恪的研究，更多地转向其安身立命的学术思想和全景式的生活，而不是聚焦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个象征性的符号。年近百岁的陈门弟子卞僧慧先生编撰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而陈寅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合撰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也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学术史上的陈寅恪应当和思想史上的陈寅恪同时得到强调，不要只记得那个有独立人格的陈寅恪。

历史往事

“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不可企及”

比起鲁迅那撇标志性的隶书“一”字胡子、“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的头发，陈寅恪的形象并不让人感觉印象深刻。

1926年7月7日，36岁的“单身汉”陈寅恪抵达北京。8月25日开学前，他到达清华园，和吴宓一起住进了清华园工字厅的西客厅，从此开启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传奇。

传奇从他来到清华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26年，梁启超推荐（一说是吴宓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时，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

自此之后，在清华园担任“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日子，可能是陈寅恪生命中最欢愉的时段。他在这里遇到了陪伴一生的妻子，遇到了爱戴他的学生，遇到了尊崇他的同道。早上，学生们会看见这个“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地去上课。风雨无阻来听课的人群里，既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也有朱自清、冯友兰、吴宓，以及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人们总会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他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讲课讲到入神处，陈寅恪往往闭目而谈，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为了他那著名的“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我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学生们当然乐得让他“拖堂”。

我们没有办法领略陈寅恪讲课的神采，只能从听过他课的“学生”的回忆里去想象。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回忆，1935年秋，他在燕京大学读研究院时，到清华偷听先生的晋南北朝史课。他当时的感受是：

“第一堂课讲石勒……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之所吸引……别位先生的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长期努力积累，似乎并不是办不到；而陈先生的学问，似乎深不可测，高不可攀，不可企及。”

姜亮夫先生也曾这样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听寅恪先生讲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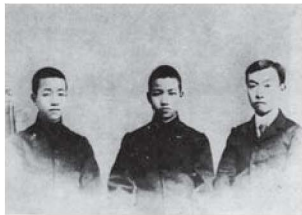
有关陈寅恪的掌故轶闻广为流传，如背着《皇清经解》留学列国16年，进过东西方多所著名大学，求教于世界第一流大学者，但学完即走，没有一个学位；能背诵“十三经”；与吴宓、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通二十几国外语（一说十几种）。这些脸谱就像放大镜，将陈寅恪放大成大象一样的存在，也让人们只能盲人摸象。

季羡林的回忆里，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有一次，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对待亲人、朋友和学生，陈寅恪是这样和蔼可亲、古道热肠，以至于那些有关他“不好接触脾气大”的传闻在对比之下尤为突兀。周扬好不容易借陈序经的面子见上一次，却聊得很不投机；1962年春天，康生来访，他以生病为由拒见，中山大学办公室人员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不见就是不见。

类似这样拒见北来要员的事，陈寅恪不止做过这一次。虽然这多少招致对其不利的后果，但他不为所动；1964年元旦，他在诗中写道：“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最“骇人听闻”的是这一次。1953年12月1日上午，陈寅恪在



陈寅恪（中）与长兄衡恪（右）、五兄隆恪少年时期的合影

自己家里和曾经的学生汪篋有一次长谈。是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汪篋奉命南下邀请老师就任。汪篋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了这次谈话。这就是后来那篇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1995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首次披露了这篇记录。

文中重申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观点，“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并据此开出就任的条件：

“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只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并且“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当时中大教授冼玉清、陈寅恪助手黄萱在场，都劝他不要这样提，陈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易中天说，这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可谓空前绝后，胆大包天。

“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他并不是一个乖僻之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只是坚持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那句十字箴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它无关政治立场，因为他所交往者中，既有傅斯年、胡适这些国民党，也有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也无关学术对错，他说过，“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他看重的是道德、人品、气节。他愿意交往或敬重者，都是人品极好、极有气节的人，都不失其读书人的本色，有的甚至还有些怪脾气。诸如俞大维、吴宓、傅斯年、蒋天枢、陈序经、刘节、黄萱、冼玉清、姜立夫等，或光明磊落，或嫉恶如仇，或刚直不阿，或诚朴笃实，或遗世独立，他们同气相求，才

能相聚。而那些他曾经交往、后来却决绝的人，则多有“变节”之举。

那些“骇人听闻”和“如沐春风”的两极影像，从两个方面将陈寅恪变成学界不可企及的神、人间完美人格的化身。这其中有多少能得陈寅恪一句“知我”的评价，有多少又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的块垒，缠绕不清。

如果可以让陈寅恪自由选择，也许他不只想做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在1919年便与陈寅恪于哈佛相识的吴宓心目中，陈寅恪除了学富五车，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他不可能忘记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家国遗恨，也很难摆脱“修齐治平”的政治情结。葛兆光说，陈寅恪似乎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经纶，只是无人领会，仿佛他一辈子并没有把世人敬仰的文字著述当成他的终极理想，而只是当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余事。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从他晚年盲目后所作《答王嘯苏君》之三“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另一种情结。他总觉得他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陈寅恪诗集》中，两用“讀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即便不如此，至少他不会选择“身与心仇”。因为家国之变，身世之痛，性格之因，闭门著书成为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1945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1962年又在浴室滑倒骨折。这一年是虎年，也是陈的“本命年”。

他能选择的空間已经很小，但他还是把自己逼进更窄的角落——绝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境遇时好时坏，即使在1966年他的特别护理被撤除，助手被赶走，工资停发，存款冻结，财物尽失，大字报把他居住的东南区一号楼完全覆盖，有如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即使“革命者”知其目不明而耳聪，便“聪明”地将高音喇叭对准其屋，在他耳边轰鸣，他1967年4月2



陈寅恪夫妇与长女流求于
清华园合影